

思念的信笺铺了15年

爸爸妈妈是在山东大学相遇并相爱的,相濡以沫60年。爸爸从山东农村离家投身革命,妈妈是来自北平女子高中的进步青年。之后,他们一起到上海。进城后,年轻的爸爸为消除“土气”,特意跑到鞋店选购了一双漂亮的鞋子,立马穿上,去对“洋学生”李梓显摆:“怎么样,这双皮鞋好看吧?”妈妈一瞧,笑得人仰马翻:天哪,他居然挑了一双下雨天穿的皮鞋!

妈妈尽管是爸爸眼中的“洋学生”,却没有娇生惯养的坏毛病,她勤劳、贤惠,孝敬老人,体恤丈夫。爸爸被调援藏工作时,我们仨分别是12岁、11岁、10岁,妈妈要忙工作,还要带三个孩子,那份艰辛可想而知。但他们那一代干部对于组织决定除了服从,别无二话。妈妈默默地为爸爸收拾行李,送他出发。一去长达15年,中间只回来5次。每次回家,爸爸一个个地摸我们的头,说:“长这么高了,胖了。”那份感慨,让我们亲切又生疏。这时,妈妈总是在厨房里忙碌。很快,她会端出一桌菜来,陪爸爸喝上一盅,拉着家常,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。

爸爸在西藏每星期写一封家信,妈妈收到后很快就会回信。一封信在路上要走半个月,收到一封,还有一封在路上。互道思念的信笺,在上海到西藏的路上,铺了15年。经常,妈妈下班回家第一句话就问:“你爸有信吗?”有时我们知道妈妈急,还故意把爸爸的信藏起来,伸手叫妈妈买水果和好吃的东西来换信。

后来,爸爸下到五七干校,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,家里3个月都没收到他的信。我们宿舍大院里的科影厂导演殷虹叔叔去西藏拍《泥石流》,妈妈就托他去找找爸爸。现在想来,妈妈当时承受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啊!“文革”期间,她基本是两点一线,不大与人交往,也不可能对年龄尚小的孩子去倾诉。后来,等我们都长大了,她才对我们说:“我那时只有努力工作,才得到一些解脱和释放,如果不是为你们三个,我恐怕都疯了。”

那年春节,爸爸回上海探亲,突然接到西藏发来的电报,说他将调回上海工作,请尽早返藏办理移交手续。当时妈妈正在炒菜,看到电报,她悲喜交集,咣哪一下扔掉勺子,抱着被高原日光晒黑的爸爸失声痛哭!爸爸终于能回家了!我们也抱着爸爸妈妈哭成了一团。痛快地哭过之后,妈妈说,我们要把家里布置得温馨一点,让你爸在家舒服些,儿子,去买两个沙发吧。弟兄俩当下就去了徐家汇家具店,然后一人一个,头顶着沙发回家来了。

爸爸任荣魁调回上海后,参与了新时期新民晚报的复刊筹备,被任命为副总编辑。妈妈也由此成为新民晚报的家属,报社邀请她在“年夜饭”上表演配音节目,她也认真地真地做了准备,为大家增加了欢乐。

我们的妈妈李梓是一位电影配音表演艺术家,她用声音塑造了许多迷人的银幕角色。她在家中的角色,则是贤妻、良母和慈祥的奶奶。我们的生命中深深地烙下了她的印记,血液里流淌着她爽直与厚道的基因。令我们骄傲的是,儿孙们拷贝不走样,都拥有李梓般的大嗓门,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这在生于上海、已届盛年的一代人中也属于比较难得吧。

我们的妈妈李梓

◆ 任澎 任放 任何

给孩子们体面的生活

妈妈有点老北京人似的讲究体面,爱把孩子们弄得干干净净。虽然爸爸常年不在家,我们也没感觉吃过多少苦。在我们长身体的岁月里,食物很紧缺,妈妈总是把最好吃的留给我们。她做的炸酱面、拌鲁菜和咖喱角,好吃又有营养。偶尔做顿大肉什么的,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,自己却不起筷,还对我们说:“你们长身体,多吃点。”

每年冬天,妈妈早就动手做新棉鞋。她拆掉旧衣服,刮浆铺硬衬。一层层、一针针地纳鞋底,划鞋样。用灯芯绒做鞋面,里面衬骆驼绒,做起一双双新棉鞋,让我们暖暖和和的。她还带我们去淮海路上马兰花童装店买衣服。粗灯芯绒衣服刚刚出现,就让我们每人穿上了一件。

“文革”时期,有一阵子流行穿军装,可是外面没有卖。妈妈就买了白色的龙头细布,自己染色,给我们

声音里有色彩有形象

妈妈40多年的配音生涯中,参与了300多部外国电影的配音,其中200多部电影担任主角,不仅有大家熟知的《叶塞尼亚》《简爱》啊!野麦岭》《卡桑德拉大桥》《英俊少年》等等,还有“文革”特殊时期不对外公映的“内部资料片”。她用声音塑造了不同命运的少女、少妇和老妪,甚至天真活泼的儿童。她的声音是有形象、有性格、有色彩的。

也许人们觉得,给外国电影配音只要拿着中文剧本,给银幕上的角色对上口型,加上语音语调念出来就可以了。其实,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。许多角色的台词,妈妈都是靠“硬功夫”背出来的。

每晚吃完饭,收拾干净,把三个孩子安顿之后,妈妈就开始加班加点。她翻开厚厚的剧本,研究人物,尝试各种语音语调和发音方式。她用红蓝铅笔,在剧本上划满各种符号。常常一晚上就翻来覆去地背那几段台词,时而霸气,时而温柔,时而洋气……我们在她的朗读声中入眠。一部电影配完,我们也能把那些主要台词背

奶奶是上天的吉祥物

大孙子任重、小孙子任远、外孙欧阳羽路先后去世,妈妈也将重心转向对小孙儿们的教导上。

任重从小跟奶奶生活,在语言上得到了有意识的培养。妈妈常在任重读课文时对他进行辅导。老朋友拍电影,也推荐他去。任远担任过电视少儿节目主持,五年级时和奶奶一起参加迎接香港回归活动,两人一起朗诵。妈妈有点紧张,中间忘词,临时补了两句。任远跟着一紧张,竟然也忘词了!后来,任远还被妈妈的学生请去译制片厂做配音,在奶奶站过的位置上,配出了经典大片。

任重上大学读的是播音主持专业,每次放假回家,妈妈都叫他拿文章念来听听。念完之后,给他指出这个重音不对,那个归音应该再准确一些……那些悉心的絮叨,对于任重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。任重毕业后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,成为一名年轻的播音主持。

有次妈妈在电视上接受采访,新邻居对任重说,昨天电视上出来的是你家奶奶吧,我们家人还说那不就是每天去买菜的老太婆吗?确实,妈妈在生活中就是个普通的有

做。染布很麻烦,要反复搓洗,妈妈的手都染得发绿了。可是满足了我们的愿望,她觉得很开心。

老大任澎18岁时去西藏工作。妈妈之所以同意他去西藏,多半也出于可以让他近距离陪陪爸爸的念想。之前,妈妈用驼色的粗毛线为他编织了一件毛衣,中间还用白色毛线织了几条夹花。临去西藏前一天,妈妈把这件毛衣洗干净,然后蹲在煤球炉边一点一点地烘烤这件毛衣。第二天早上大哥起床后,看到妈妈还在烤毛衣。原来她把那件湿漉漉的粗毛衣,翻来覆去地烘了一个晚上。这场景让大哥终生难忘。这么多年,很多东西都坏了丢了,唯有这件毛衣保存了下来。

老二任放在八十年代初结婚时,物质还不那么丰富,妈妈却要给任家的孩子最大的体面。她精心为女儿准备陪嫁,亲自挑选了各种颜色的织锦缎被面,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起了好几条陪嫁的被子。

个七七八八的。有时我们在被窝里听到怪声怪气的语调,完全不像她平时说话的声音,就会忍不住发笑,疯起来还学上几句。

为了不影响我们睡眠,妈妈时常跑到厕所去工作。她每天都要练嗓子,最大程度去拓展音域,以求适应各种类型的角色需求。在译制《简爱》时,妈妈读原著去了解故事和人物,做了很多笔记。《叶塞尼亚》和《冷酷的心》好几个剧本,至今还保存在家里。

当年没有空调,为了配音效果好,大热天气,也只能闷在录音棚里,在全封闭环境下工作,非常辛苦。“文革”后期,为了赶制所谓保密级的“内参片”,妈妈时常通宵达旦地工作,在食堂里打地铺,星期天都回不了家。

有一次小弟任何放学后去录音棚,发现站在话筒前的妈妈,说起话来手舞足蹈,就像银幕上的角色。边上的男演员还拿着一根皮带当鞭子,穿着靴子,狠狠地跺地板,完全进入了角色。妈妈曾告诉我们:“我们塑造角色,要理解她的情感,贴近她的状态。”

点冷幽默的老太太。有次她问任重:“别人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奶奶吗?是不是很羡慕有这样一个人对你辅导培养?”任重说:“奶奶是上天赐予我的吉祥物!”

2012年11月24日,小孙子任远的女儿出生了。妈妈有了第四代十分高兴。当时她已经罹患帕金森病,然而重孙女出生第四天,她就从一楼跑到五楼去看孩子。几个月之后过春节,一家吃年夜饭时,小宝贝已经会做鬼脸了。妈妈逗她玩,抱着重孙女爱不释手。

外孙欧阳羽路赴美国留学后,成为洛杉矶汇丰银行的高管。得知外婆去世的消息,洛杉矶当地她很多华人朋友,甚至有些美国人都向他表示了哀悼和惋惜。有朋友说:“改革开放初期,就是看了你外婆配音的外国译制片,才认识了外面的世界。我们是听着李梓老师的配音长大的。”

妈妈晚年患病后身体越来越弱,每次我们去看她,她都会把每个人都问一遍,心里还在深深地牵挂着我们。看着妈妈像一朵花一样在凋谢、干涸,我们却无能为力,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今年1月5日,妈妈在昏睡中与我们永别。她获得了解脱,天堂里没有病痛。今后春节我们再也吃不到妈妈包的饺子,听不到她清脆的笑声,一家人吃饭,那个位置就永远是空的了。但是,她会永远住在我们心里最宝贵的地方。

隆冬过后,又将是春寒料峭的日子。这样的时节,对我的恩师——人民艺术家袁雪芬老师的思念更加浓重。老师从一个普通的乡村女孩起步,一路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和磨难,但是从不曾向命运屈服,最终不仅在越剧艺术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成就,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戏曲的发展。

至今,我眼前仍常常清晰地浮现她那一双写满坚毅的眼睛,那一双谈到艺术就会发光的眼睛。那是一双深藏着慈母柔情的眼睛,那是一双谦逊却不乏真诚和正直的眼睛。

不知不觉,她老人家离去已经整整三年了。三年来,我害怕走到老师居住过的新康花园那熟悉的小径,害怕看到那幢熟悉的房子。物是人非,庭院里依旧花开花落,却再也见不到我的恩师那可亲可敬的身影,怎不令人伤怀!然而,我要告慰老师在天之灵的是,在她走后的时间里,我似乎一天下成熟了很多。我不再是以前那个爱开玩笑的调皮鬼。老师生前的真诚待人,那股对美好事物和艺术坚韧不拔的追求精神,如今都是我重要的人生参照。

2012年,我被“赶鸭子上架”,经推选做了上海越剧院一团团长。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的我,一时间很心虚,很茫然。遇到困难时,我脑子里经常会闪过老师生前面对各种纷扰复杂问题的情景。

老师生前不但是一个建树颇丰的艺术家,更是一个出色的戏曲院团领导。在我眼里,老师做领导并不是高高在上地端着架子,而是尊重、关心每一个团队成员。从解放前的“雷声剧团”到上海越剧院,都是有口皆碑。老师一直关心每一位演职人员的生活状况,从分房子、评职称,到生孩子、看毛病,她都努力为演职人员争取公平和尽可能好的待遇,急他人所急。走到越剧院里,时常可以听到老一辈的同事说“老袁”是他们的恩人,因为老师不但在艺术上引领大家,在生活中也为他们解决了许多很切实的问题,有时甚至比当事人及他们的亲友考虑得更为周全。

以老师为榜样,我作为一个团长,也一直努力做到关注团里的每一分子,设身处地地关心他们。去年,我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徐标新在演出中嗓子出现问题,虽然当时正在排练《画皮》一剧,他担任“小黑”这个重要角色,临时换演员面临着诸多困难,但经过慎重考虑,我还是决定让标新休息治疗。我深知,作为一个戏曲演员,嗓音条件至关重要,若是勉强上台,必将带来更大的损害,这对他今后的发展和前景是不利的。作为一个团长,爱护一个演员不仅仅是给他一时的机会,更要为他的长远负责。

老师一生乐善好施,慷慨待人,这些品行都深深影响着我。目前戏曲院团职工收入和社会上其他行业收入相比,还是很有差距的。我作为一个成名的演员,收入相对其他人要好一点。当剧团的同事在聚会或遇到困难时分享到自掏腰包相助的财物时,我感到很快乐。老师的儿子常常为此赞许我和老师的风格相同。分享和付出,是老师传给我的快乐法宝。

2013年末,我荣获院里颁发的“园丁奖”,惶恐之余,我也深感肩上的重任。“园丁奖”意味着教戏育人将是我未来工作的重心。我相信老师也一定在天上看着我,希望我能为她终生追求的越剧事业尽一份力,有所作为。越剧艺术要继续发展,袁派艺术要传承和发扬,都离不开越剧新人的培养。如今,我可以很欣慰地告诉老师,我的几个学生,徐莱、徐晓飞、俞景岚、陈慧迪等,已逐渐为观众所认可,成为越剧舞台的新主角。我也会牢记老师有教无类、不图虚名的做法,摒弃传统的师徒观念,摒弃流派之隔,一切以越剧的长远发展为准则。

目前,我非常珍惜自己在舞台上的每一刻,渴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最近我一直在紧张地排演越剧新编古装戏《铜雀台》。老师在世的时候,这个题材曾经排过两次,这次仍由我们男女合演团演出,视角也从全新的女性视角,将原先的“花瓶角色”甄洛提升为全剧的主角,重塑这位传奇女性。这对我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我希望能衬托戏中两位男主角——我团的优秀男演员春雷和标新,更希望能学习老师在角色塑造方面的钻研和打磨精神,突破甄洛原来“花瓶角色”的局限,努力达到符合人物的声情并茂。

新的一年,我要告诉老师一个重大的好消息——阔别舞台近七十年的袁范版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复排终于排上了日程,将于下半年和广大观众见面了!老师生前,一直有观众要求复排袁范版的《梁祝》。老师对《梁祝》这个戏怀着特别的感情,她曾和我说过,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她和马樟花演出《梁祝哀史》时,就决心好好整理这个传统老戏,让它成为越剧精品。老师不但对《梁祝》剧本、唱词和表演方式等的整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,而且是在越剧历史上第一个将自己创造的、成为现在越剧主要曲调的“尺调腔”应用到《梁祝》的演唱中。如今,不论哪种版本的《梁祝》都在分享着老师当年的创造。1953年,老师和范瑞娟老师主演的彩色电影《梁祝》风靡全国,在观众心目中成为绝响。我希望能将老师演绎的《梁祝》经典版本传承下去,给广大越剧观众的期盼作一个交待。

工作会有挫折,生活会有起伏,但每每想到老师,我便能找到新的力量和勇气,继续前行。我很庆幸那样一个出色的女性曾经作为我的导师,培育我多年。她留给我的,不仅仅是演唱和表演技能,更多的是无穷尽的精神财富。

无穷尽的财富

◆ 方亚芬

